

第三章

走向全面抗战道路

第一节 华北事变

一、日本在华北的军事与经济扩张

日本军队在我国华北驻扎,可以追溯到1901年9月7日清朝政府与英、俄、日、德、法、美、意、奥、比、西、荷等11国公使签订的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该约第七款规定:“大清国国家允定,各使馆境界,以为专与住用之处,并独由使馆管理,中国人民概不准在界内居住,亦可自行防守。”“中国国家应允,由诸国分应自主,常留兵队,分保使馆。”^① 第九款规定:“中国国家应允,由诸国分应

①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1006~1007页,三联书店1980年10月版

第一编 日本侵华与中国的局部抗战

主办,会同酌定数处,留兵驻守,以保京师至海通道无断绝之虞。今诸国驻守之外至:黄村、廊坊、杨村、天津、军粮城、塘沽、芦台、唐山、滦州、昌黎、秦皇岛、山海关。”^① 这些规定使外国军队在上述地区驻扎合法化。日本在《辛丑条约》签字之前的两个月,以“护路”和“护侨”为名,向中国派遣了总兵力约2600名的驻屯军,命名为“清国驻屯军”。9月签约之后,驻屯军司令部移驻天津日本租界地张园,兵营分天津海光寺和北京东交民巷两处。1912年日本陆军省将清国驻屯军更名为“中国驻屯军”,因为司令部在天津,又称“天津驻屯军”。

其后,随着日本侵华政策的步步实施,日本在侵占我国东北之后,随即向华北地区进一步扩张,制定了一系列分离华北、控制华北的战略。军事上,《塘沽停战协定》的签订,日本强划冀东25县为“非武装地带”,成为向华北扩张的第一步。1935年1月,驻热河日军向察哈尔省东部发动进攻,与驻守的中国方面宋哲元军发生冲突。2月2日,在日本的胁迫下,宋哲元同日本达成《大滩协定》,规定29军不得进入石头城子、南石柱子、东栅子之线及其以东地域。日本通过发动察东事件,打开了侵入华北的大门,开始全面干涉华北政治。^②

然而由于日本国内政治斗争制约和军事、经济力量的限制,并顾忌英美等国的反对,日本侵略华北的方针,采取与侵占东北不同的方法,在继续发动军事进攻的同时,主要以政治谋略策动华北脱离南京国民政府,实行“独立”,以实现其不战而取华北的目的。到

①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1006~1007页,三联书店1980年10月版。

② 《何应钦致林森、汪精卫、蒋介石电》(1935年2月5日),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935年4月,这种所谓政治谋略便具体确定为:“在内蒙和内蒙以外的华北地区制造自治政权。……在华北是要使这五省脱离南京政府,建立一个在日本领导下同‘满洲国’有密切关系的特殊区域。”^①

为此,日本竭力寻机把国民党中央的党政军势力驱逐出华北,以便控制华北政治。自1935年5月1日起,华北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导致南京国民政府在华北地区的溃败,酿成第一次华北危机。

5月1日晚,天津《国权报》社长胡思溥在日租界内被暗杀。第二天凌晨,天津《振报》社长白逾桓也在日租界内被暗杀。接着发生了东北义勇军孙永勤军进入长城和易水《闲话皇帝》一文事件,日本立即抓住时机压迫中国,导致华北局势急剧尖锐化。

29日,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日本驻北平使馆武官高桥坦向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口头提出抗议,宣称:“今后如再发生如此行为,或得悉将要发生此种行为,日本军将根据条约的规定,采取自认为必要的自卫行动,由此而产生的其他一切事态,日军概不负责。”^②紧接着,日本向国民政府提出事先预谋的要求: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下野;河北省政府移至保定;宪兵第3团团团长蒋孝先及军分会政治处处长曾扩情应予免职;办胡、白案犯人等。

5月31日,国民政府不得不对日方的要求作出回应,授权驻日大使蒋作宾告知广田弘毅外相,平津地区无论如何不能划作停战区域;于学忠更调系中国内政;河北省政府早已确定迁往保定。

① 《东京审判法庭证据》,见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1分册,第283~28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9月版。

② 日本防卫厅研究所编:《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1分册,第32页。

即付执行。^① 日本遂即采取使事件恶化的手段,天津日本驻屯军立即连日以坦克车、轻炮和机关枪队在河北省政府门前武装示威,并在天津举行巷战演习。在日本的恐吓下,北平军分会按日本的要求,将曾扩情、蒋孝先撤职。6月9日,酒井、高桥又向何应钦提出了下列更为苛刻的要求:(1)取消河北省包括铁路党部在内的一切国民党党部;(2)撤退河北的东北军第51军、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军及宪兵第3团;(3)解散北平军分会政治训练处、蓝衣社、励志社等机关及第25师的学生班;(4)撤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及其他所指各官吏;(5)取缔全国一切反日活动及团体。10月,国民政府终于作出了全面让步的决定,汪精卫电令何应钦全面承诺日本要求。7月6日,何应钦复函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正式承诺日本的各项要求,谓“六月九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事,均承诺之,并自主的期其遂行”。^② 从而事实上成立了《何梅协定》。至此,国民党中央系和东北系势力退出华北,日本终于打破了国民政府希图把日本势力控制在长城以北的幻想,开始对华北政治发挥更大的影响,华北从此成为日本势力和华北地方实力派的交易场所。华北政局顿形严峻。

“河北事件”纠缠未清,日本又在极力寻找压迫宋哲元的机会。1935年6月5日,日本关东军军官山本一行四人没持护照潜入察哈尔省,测绘地图,刺探情报,在张北县被29军宋哲元部扣留。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为免引起事端,释放了山本等人。日本方面立即抓住这一机会,称其为“张北事件”,展开了把宋哲元逐出察哈尔省的政治、军事行动。11日,日方以日军官被恐吓为借口,向第29军副军长、察省民政厅长秦德纯提出“惩办”132师军法处长等三

① 《中国外交年鉴》,第176页,1936年3月初版,正中书局印行。

② 南京国民政府军事机关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项无理要求。17日,日本方面制定出《对宋哲元交涉纲要》,决定“由土肥原直接交涉,密切同天津驻屯军等接触,打开同宋哲元的直接谈判”,并“为了迅速完成谈判,保证中国的顺从,关东军一部将对热河采取行动”,“使宋哲元军对日军在察哈尔省的行动绝对不干扰”。^① 南京国民政府低估了日本控制察哈尔省的阴谋,为求得事件的妥协,19日发布命令,免去宋哲元察省主席的职务,改任秦德纯代理察省主席。日本迅速扩大突破口,6月23日,日本驻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等向秦德纯提出了苛刻要求,同时派遣便衣队深入察哈尔省进行骚扰破坏活动。在日本的胁迫下,国民政府再次屈服,27日,秦德纯与土肥原在北平正式签订了《秦土协定》,认可了日本先前提出的诸项要求。其主要内容为:(1)成立察东非武装区,第29军从该地区全部撤退;(2)宋哲元向日军道歉,惩罚直接责任者;(3)解散察省排日机关;(4)停止山东向察省移民。^②

至此,日本侵略者通过上述两个协定,实际控制了冀察两省,日本在华北扩张的地位进一步巩固。

掠夺华北的战略资源是日本在华北扩张战略的重要一环,也是驱使日本在华北军事和政治扩张的重要动力。早在1933年11月,“满铁”即制定了《华北经济调查设计》,此后又派人两次到华北考察,制定了向华北经济扩张的实施方案。^③ 1935年3月30日,关东军制定了《关东军对华政策》,其中对华北的政策为“对华北要根据实际的经济力量的扩张,逐步尽力加强不可分的关系。”^④ 此

① 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③ [日]中村隆英:《日本的华北经济工作》,载《东亚与日本》,第161~162页,山川出版社1980年版。

④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第1分册第26页。

第一编 日本侵华与中国的局部抗战

后,日本加紧了对华的经济调查活动,以调查为目的的常设机构也不断增多,其重要者就有大藏省的东亚经济课、“满铁”驻天津事务所、天津驻屯军司令部的经济顾问部等。^①与此同时,日军利用《塘沽协定》中将冀东划为“非武装地区”的规定,开始禁止中国海关的巡逻船舶进入冀东沿海,“于是,由东北循海、陆两路向冀东走私成了完全放任的状态”。^②

至1935年底,日本“华北经济提携”的声浪虽然高涨一时,然而,由于日本侵略者所策动的“华北自治运动”尚未完成,因此,日本对华北的投资并不活跃。这一时期,除1935年12月“满铁”成立兴中公司,并为“开发”华北资源在天津设立了分公司外,“华北经济提携”并无具体结果。

二、华北危机的深化

随着国民党势力的撤退,一时间华北出现权力真空,失去了维持政治平衡的力量。日本乘机加快了分离华北的步伐,加紧策动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同时以“华北经济提携”为名,从经济上加紧扩张和掠夺。

日本策动华北“自治”,把希望寄托在华北地方实力派和亲日势力上。“最初的计划是使下野寓居北平的吴佩孚东山再起,组织五省联盟自治政府”,^③但这个计划因各种原因未能实现。而后,又有反复劝诱河北省主席于学忠“独立”之举,然而于学忠“均置之不理”。^④日本又转向拥戴孙传芳任“自治运动”的首领,结果遭到

① 周开庆:《一九三六年之中日关系》第175页,正中书局1937年版。

② [日]古屋奎三:《“蒋总统”秘录》(全译本)第10册,第95页,台湾中央日报译印。

③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土肥原秘录》,第87页,中华书局出版。

④ 刘家鸾:《日寇侵略华北冀察政权的形成》,《文史资料选辑》第63辑第62页。

了孙的公开拒绝。^①宋哲元被逐出察省后,利用汉奸白坚武在北平制造暴乱的机会,将29军“来平驻防,以资镇慑。”^②宋哲元进入平津,改变了自国民党中央党政军势力退出后华北的政治、军事格局,成了这一地区能与日本抗衡的主要力量。日本于是转而把华北“自治”的希望寄托于宋哲元,迅速进行促使宋哲元实行“自治”的步骤。1935年10月,日本派曾主谋策划伪“满洲国”的土肥原进入北平主持此事。开始,土肥原想说服宋哲元与国民党河北省蓟密区兼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合作,共同脱离南京,成立“自治政府”,为宋所拒。日本于是加紧在华北制造“自治”的气氛,企图逼宋就范。

10月22日,河北省香河县汉奸武宜亭等在日人指使下,借口反对附加税,占领县城,成立了“临时维持会”,制造了“香河事件”;白坚武也在天津组织了“华北自治救国军”,天津并出现了“华北民众促进会”、“华北人民自救会”等所谓“自治”团体。土肥原根据日本三相会议作出的“华北自治运动应循序渐进,目前自治的内容为轻度自治”^③的决定,考虑到宋哲元对“自治”的暧昧态度,决定先让殷汝耕成立“自治”政权。11月24日,殷汝耕在通县发表宣言,宣告冀东停战区“脱离中央”,“自治独立”,并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25日,又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冀东22县实际沦入敌手。

殷汝耕的公开叛国,使南京国民政府措手不及。11月26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撤销北平军分会,以军政部长

① 吴相湘著:《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第212页

② 《国闻周报》(1935年7月8日)第12卷,第26期。

③ [日]秦郁彦:《日中战争史》,第64页,河也书房新社1972年版

第一编 日本侵华与中国的局部抗战

何应钦为驻平长官;任命宋哲元为冀察绥靖主任,殷汝耕免职拿办。^① 日本一面调兵遣将,把部队从锦州移向榆关,作出武力支持冀东伪政权的姿态;另一方面又逼使宋哲元等人或与殷汝耕“合流”,完全“独立”,或“藉口西南有政务委员会,则华北有何不可创造类似组织,即可截留税款,委派官吏,形成独立之状态”。^② 南京国民政府为了不使华北脱离中央,向日本作出重大让步,提出了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方案,放弃试图控制华北的方案,将华北大权完全交给宋哲元。^③ 12月11日,南京政府发表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决定,并公布了人选名单,宋哲元任委员长。18日,冀察政务委员会在北平成立。它的成立,适应了日本侵略的要求,彻底改变了华北行政传统和行政机构,冀察两省实际上已变作“自治”,华北主权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

从1936年初开始,日本又加紧采取以经济掠夺为主的侵略方针,企图达到全面控制华北的目的,华北的危机进一步深化。9月,天津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借助华北经济提携”的口号,逼迫宋哲元实行所谓“四原则、八要项”的经济“开发”计划,即由日本贷款,提供技术人员,双方合作在华北地区开发航空、铁路、煤炭、铁矿、港口、电力、通讯、农业、渔业九个行业。^④ 日本“开发”华北的经济计划,首先提出了交通运输的开发,这不仅仅是出于对华北掠夺的需要,也是出于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的需要。因此,日本除了重视(天)津石(家庄)铁路和塘沽海港的建设,还重视华北航空

① 天津《大公报》1935年11月27日

② 《蒋介石致陈济棠、李宗仁电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736页。

③ 《何应钦致蒋介石电报》,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731页。

④ 《现代史资料八·日中战争》,第368~371页。

业的发展。1936年10月,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堀内干城迫使宋哲元在北平签订了《华北通行协定》。10月23日在天津设立了中日合办的惠通公司,经办中日通航事宜。协定规定的航线计有:天津—大连线,天津—北平—承德线,天津—北平—张家口—张北线和北平—天津—锦州线等四线。津连线衔接日本国内航线,以后日本与天津间可朝发夕至;而津承、津锦两线则恰和伪满的空路组成一个航空网;平张线则可以联结内蒙,这“对于增加日本侵略华北军事上的便利,不言而喻”。^①

随着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冀东地区实为日军控制之后,华北走私活动愈为猖獗,形成了日军、日本私枭和伪“冀东政府”三位一体的走私状态。仅1936年5月5日至12日的一周间,从冀东走私到天津的货物即有:人造丝1300万公斤,砂糖603万公斤,卷烟张3万公斤,棉布3000捆,海杂货8000包,煤油、汽油4775箱。^②大量的走私贸易,使南京国民政府的大宗财政收入——关税收入受到了严重损害。自1935年8月1日至1936年4月30日,因华北走私,海关税收损失共计25506946元,其中1936年4月份一个月损失达800万元,“占税收全部几达三分之一”。^③

三、南京政府对日政策的转变

随着日蒋矛盾的加深,蒋介石深感中日战争“已无法避免”,^④同时,从客观上来说,中国工农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失利,使蒋介石的“心腹之患”有所缓解,这也促进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政

① 李云汉:《抗战前华北政局史料》,第556~557页。

② 《华北事变资料选编》,第529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③ 国民政府关务署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④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国国民党党史文献选编》,第230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版。

策发生了若干转变。

从未来对日作战的战略出发,为了遏制日本在华势力的扩张,从1934年起,蒋介石开始寻求同苏联改善关系。1934年6月,蒋介石派蒋廷黻赴苏“测探中苏两军合作的可能性”,^①并向苏方说明“目前阶段中国的外交政策不代表也不反映中华民族的感情,但……这个阶段的时间将不会太长”。^②为了取得苏方的谅解和信任,蒋介石一再表示准备在国内“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同中国共产党和解合作抗日”,^③作出了谋求改善对苏关系的外交姿态。华北事变后,蒋介石为牵制日本,采取措施改善与苏联的关系。1935年10月25日,作为对苏联表示友好的一种姿态,在南京成立了中苏文化友好协会,立法院院长孙科任主席。同年秋天,蒋介石要驻苏武官邓文仪回国述职,获悉苏联政府支持中国抵抗日本以后,蒋介石便指派陈立夫出面同苏联驻中国大使鲍格莫洛夫会谈。年底,蒋介石派陈立夫、张冲秘密去莫斯科同斯大林谈判,因故谈判未成。^④陈立夫于1936年春离开莫斯科回国。南京政府同苏联的关系有所改善。

1935年11月12日至23日,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举行。蒋介石在向大会作关于对外关系的讲演时,虽表示“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

① 《蒋廷黻回忆录》,第153页,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3月版。

② [苏]R. A. 米罗乌依兹长雅:《过去的教训》,载《远东问题》,第224页,1982年版。

③ [苏]委托夫:《1935年~1936年南京政府同苏联的谈判》,载《党史研究》1985年第4期。

④ 因蒋介石认为与苏联就建立军事同盟举行谈判时机未到,遂命陈立夫等返国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在南京继续交涉。参见陈立夫:《参加抗战准备工作之回忆》,载《传记文学》,第31卷,第1期。

决不轻言牺牲”。^①但也表示了若到和平完全绝望的时刻与牺牲的最后关头,则“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②同时调动部队在南京附近演习,并以一部北上。《何梅协定》、《秦土协定》把国民党最终推向了“忍无可忍、让无可让”的地步,^③随后国民政府在对日交涉中,态度也有所强硬,由妥协开始转向抵制,标志着其对日政策确已开始发生若干实际转变。

针对日本在华北加紧策动“自治”运动,对华北地方实力派威逼利诱,蒋介石于1935年11月20日致电宋哲元,否定了宋与日本磋商“自治”方案的打算,并表示中央必当以实力为后盾,决不令他独为其难,而与之共同为共同之牺牲也。^④他还电告河北省主席商震:“如平津自由行动降敌求全,则中央决无迁就依违之可能,当下最后之决心。”^⑤为此,蒋介石将大军调至津浦、陇海一线,并命河南省赶造渡黄河之船只,以备华北发生不测。自1935年秋起,国民党在与中共秘密接触的同时,对日本政府屡次提出的“中日共同防共”要求予以拒绝。此时蒋介石认为“日本为我国最大的危险,甚至不惮考虑与所谓共产党合作,以对付日本。但反共协定之缔结,其唯一效果只有加深中日间的裂痕,而不是将其缩小”。^⑥在此之后进行的对日政治交涉中,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张群多次表示:“防共纯系内政问题,无待与任何第三者协商。”^⑦在处理中日之

① 《革命文献》,第76辑,第251页。

② 《革命文献》,第76辑,第251页。

③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载《中国国民党党史文献选编》,第230~231页。

④ 《总统府机要档案》,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714页。

⑤ 《总统府机要档案》,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714~715页。

⑥ 董显光:《蒋总统传》(中),第245页,台湾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2年版。

⑦ 《中国国民党党史文献选编》,第237页。

间悬案上,国民政府的态度转趋强硬。同时,随着对日政策的转变,国民政府在内政、经济、教育、军事等方面,开始着手准备抗战。

四、国共两党的初步接触

华北事变的发生,严重地动摇了国民政府在华北的地位,也进一步表明日蒋矛盾的不可调和,成为国民党内外政策转变的一大关键,国民党对中共的策略开始有所调整。蒋介石一面继续“剿共”,命令胡宗南、阎锡山以及东北军、第17路军进攻红军;一面利用抗日的旗帜与共产党拉关系,通过谈判,达到其“溶共”的目的。同共产党的接触是在国内外同时进行的。1935年冬,蒋介石急令邓文仪速返莫斯科。1936年1月,邓返莫斯科后,立即为沟通同共产党关系进行了紧张活动。1月13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定潘汉年为联系人,王明团长与邓文仪进行了双方的第一次接触。^①不久,王明与邓文仪进行了接触和会谈。会谈中,王明认为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的中央都在国内,谈判以在国内进行为好。王明此时“曾考虑先与蒋介石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但不久“一月谈判破裂”。

在国内,蒋介石把打通同共产党关系的事交给陈立夫主持。1935年11月,陈立夫通过曾养甫、谌小岑与吕振羽联系,寻找共产党的关系。吕振羽当时受中共北平市委和北方局周小舟领导,他根据中共的指示于12月底到达南京,会见曾养甫,探明情况。随后周小舟往返津京之间约10余次,作为正式代表与曾养甫商谈

^① 《潘汉年与邓文仪1936年1月13日谈判情况纪要》,转引自《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1期,第245页。

合作抗日的条件。^①同时,谌小岑还通过左恭的关系,在上海与中共组织联系,中共方面派张子华于1935年12月到南京和曾养甫等交谈。南京会谈一度进行得较为顺利,国民党方面答应,国民党欢迎共产党如有政治上的意见,可以通过即将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供中央采择;共产党可以选择一地区试验其政治理想。^②

1935年底,宋子文奉蒋介石的指示,在同宋庆龄商议后,决定请董健吾去陕北,直接向中共中央传递国民党愿意谈判的信息。^③董健吾和张子华于1936年2月底到达陕北瓦窑堡。当时,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等率领红军东征在前线。秦邦宪等立即把董、张前来传递国民党要求谈判信息一事电告毛泽东。3月,张子华去东征前线向毛泽东、张闻天等汇报南京国民党内各派对抗日的态度。当董健吾即将返沪时,3月4日,毛泽东、张闻天等致电秦邦宪并转董健吾,表示“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电文并提出了合作抗日的五条意见:“(1)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2)组织抗日政府与抗日联军;(3)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4)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5)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3月5日,董健吾携带中共中央给南京方面的信件离开陕北到西安,不久回到上海,向宋庆龄汇报了陕北之行的结果。这样,国共两党中断了近十年的关系,重新建立起来了。

1936年8月25日,潘汉年在西安得到与南京政府谈判的指

① 《周小舟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36年8月29日),转引自《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1期,第248页。

② 谌小岑:《西安事变前一年国共两党关于联合抗日问题的一段接触》,见《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第14~15页。

③ 参见《党史通讯》1987年第5期,第19页。

第一编 日本侵华与中国的局部抗战

令,后因中共中央决定派张子华返南京邀请国民党负责人来陕谈判,^①又改变了这一计划。但到了10月21日,中共中央又复令在西安的张子华电告曾养甫、陈立夫,决定先派潘汉年与其谈判。22日,南京方面复电同意,中共中央正式电令潘赴南京同陈立夫举行会谈。1936年11月10日,潘汉年在上海沧州饭店与陈立夫会谈,并面交了周恩来给陈氏兄弟的信,口头转达了中共中央起草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并希望以此作为谈判的基础。然而,蒋介石从一开始“打通共产党关系”时起,只是主观认为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军事上已走到了绝境”。因此他对中共的策略是在解除中共武装的基础上,再给以政治上的“出路”,以实现其“溶共”的目的。在解决了两广事变后,蒋介石飞往西安,压迫张学良、杨虎城继续“剿共”,并在军事上作了部署。谈判中,陈立夫强调蒋介石的中心意旨是必须先解决军事,其他一切都好办,并提出请周恩来出来谈判。潘汉年明确答复:停战问题不解决,周恩来是不可能出来谈判的。之后,潘汉年和陈立夫又进行了两次谈判。陈立夫虽同意将保留红军3000人改为30000人,但是企图收编红军的反共立场没有改变。至此,会谈已无法继续进行。后来,国民党方面张冲屡次会见潘汉年,表示国共谈判不宜中止。

尽管西安事变前国民党对中共实行剿抚兼施,以剿为主的政策,与共产党的接触和谈判也只是一种试探的性质,并无联共抗日的诚意,但在当时国难深重和两党严重对立的情况下,两党的初步接触和会谈远远超出了它的具体结果,实际上拉开了国共两党重新合作抗日的帷幕。

^① 《周恩来致陈果夫、陈立夫的信》(1936年9月1日),见《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1期第255页。

第二节 西北地区抗日运动的高涨

一、中国工农红军东征抗日

在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中国共产党面对华北事变以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新形势,于1935年12月在瓦窑堡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根据国内政治形势的特点和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制定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新策略,即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瓦窑堡会议后,为了团结抗日,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打通东进抗日路线,巩固扩大现有苏区,中共中央将红军第一方面军和原在陕北的各支红军改编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以彭德怀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委、叶剑英为参谋长、杨尚昆为政治部主任,下辖红军第1军团、第15军团和第28军,共20000余人,奔赴抗日前线。1936年2月17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发布《东征宣言》,陕北红军渡河东征。2月20日夜,红军主力由距中阳县三高镇20余里的王家坪渡口以羊皮筏子强渡黄河,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防线,进入晋西地区。

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太原绥靖公署主任的阎锡山闻讯,立即召开河防会议,商讨阻止红军入晋办法。会上阎锡山决定将晋军集中于汾阳、离石、孝义、中阳山地,对红军实行所谓“口袋阵”战术,任命杨爱源为作战总指挥,下辖4个纵队共7个师。杨将总部设在孝义城,指挥抗击红军。

红军第1和第15军团及第28军在刘志丹、徐海东的率领下渡河后,突破了阎锡山的碉堡封锁线,直捣三关镇,包围中阳;一部直逼汾阳、文水。阎锡山急调已入陕北的孙楚部回援,并令晋军第

一纵队杨澄源部守汾城、稷山,确保晋南;第二纵队杨效欧部守孝义、汾阳,防红军东占太原;第三纵队李达生部守晋北兴宁、崞岗,阻红军第28军刘志丹部前进;第四纵队孙楚部由陕返离石后,与第一纵队协同,对付中阳、石楼一带的红军,同时调遣独立第二旅周原健部赶赴中阳关上镇阻击红军,3月上旬,其第二纵队突入兑九峪地区,于10日被红军歼灭两团。周原健部在关上镇与红军展开激战,被红军全部歼灭。红军继续东进至孝义县,与杨效欧部发生激烈战斗,双方伤亡很大。3、4月间,红15军团在北上向太原挺进,红一军团挥师南下,截断了同蒲线,直趋临汾。

为支持阎锡山阻击红军,蒋介石任命陈诚为“陕甘宁青四省剿匪总指挥”,率领汤恩伯、李仙洲、孙令恂、商震等中央军部队约10个师号称“15万中央大军”,^①从3月上旬起,分两路进入;一路自风陵渡过黄河,沿同蒲路北上;一路沿正庆路西进,开赴晋中,同时,蒋介石又令驻守在黄河以西的部队,沿河北上,向陕甘革命根据地进攻,滋扰红军后方,企图包抄东征红军后路。

1936年3月中旬,红军第15军团等部绕过汾阳,挺进文水、交城;刘志丹等28军则从兴县向南推进,击败晋军的堵击,南进抵达白文镇。3月底,红15军团从文水、交城放弃攻袭太原计划,回师白文镇与红28军会师。红军主力会师后继续南下进入离石、中阳地区,在三关镇与晋军陈长捷旅激战,红第28军长刘志丹于4月14日在激战中不幸牺牲。红28军攻克三关镇后,向西撤去。与此同时,红1军团由孝义南下到达灵石县,击溃晋军的阻拦,继续推进。由于晋军杨澄源部大部分调往晋西作战,晋南一带少数守军在红军的猛烈攻击下溃不成军,红军先后攻占襄陵、侯马,包围霍县、赵城、洪洞、浮山等地,直逼山西重镇临汾。负责守卫临汾

^① 《晋阳日报》1936年3月7日。

的杨澄源部参谋长李鉴三手中无兵,连电告急。阎锡山电请中央军援晋关麟征师、汤恩伯军等部沿同蒲路急进救援。

中共中央全面分析了山西的战局及发展状况,为顾全大局、保存抗日力量,促进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实现,在东征红军取得重大胜利的情况下,决定红军回师。5月初,红军抗日先锋队分两路分别从永和、兴县境内西渡黄河,返回陕北革命根据地。5月5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敦促南京国民政府在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幡然改悔,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并表示:“愿意在一个月内在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一致抗日的目的。”^①红军东进抗日和受阻后主动回师清楚地表明:迅速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迫在眉睫。

二、西北地区抗日力量的联合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西北后,蒋介石企图一举歼灭之。驻西北地区的东北军和第17路军,在民族危亡面前,抗日救国情绪日益高涨;同时,由于不满蒋介石的排挤,对红军“围剿”的失败,日益对内战感到厌倦。中共为打破蒋介石的“围剿”,实现立足西北和准备抗日的方针,必须争取红军与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联合,结成“三位一体”的统一战线。

1935年底,红军完成了长征。张学良就任“西北剿匪副司令”后,会同杨虎城的西北军,共同“围剿”红军。但是,事与愿违,从1935年9月到11月间,在劳山、榆林桥、直罗镇战役中,东北军三战三败,损失兵力近3个师,109师师长牛元峰、110师师长何立中

^① 《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载《红色中华》(1936年5月16日)。

和参谋长范骝洲等被击毙,近万名东北军被红军俘虏。对此,蒋介石不仅不予补充,还宣布撤销被歼灭的 109 师、110 师两个师的番号,并对张学良加以申斥,这对张学良的震动很大。

此时,中共中央加强了对张学良的争取工作。1936 年 1 月,毛泽东、彭德怀等人致书东北军全体将士,表示中华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愿意与任何抗日的武装队伍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去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并“愿意首先同东北军来共同实现这一主张”。^①这在东北军中产生了很大影响。2 月、3 月间,张学良和东北军第 67 军军长王以哲先后在洛川会见了共产党代表李克农,就联合抗日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并为下一步更高级的会谈作了安排。4 月 9 日,张学良、王以哲在肤施(延安)与中共代表周恩来、李克农正式举行会谈。会谈达成九点协议:(1)为了准备抗日,红军愿意接受视察、整编与集训;(2)须保证红军不受欺骗或解除武装;(3)在江西、海南岛及大别山的红军也进行整编;(4)取消红军称号,改为统一番号;(5)中共党员不在军队内活动;(6)停止发动各种斗争;(7)释放被俘的中共党员;(8)中共之非军事人员得住在陕北;(9)抗战胜利后,中共将成为合法政党。同时,双方还在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及红军帮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教育等方面成立了协定。这是东北军走上联共抗日道路的重要一步,对于西北地区抗日力量的联合以及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都具有重要意义。至此,东北军与红军前线部队的敌对基本结束,关系越来越密切。东北军接受红军代表叶剑英常驻西安,帮助改造部队,准备抗日。东北军的一些前线部队,也直接同对峙的红军签订了停战协定。9 月 18 日,东北军骑兵第 6 师代表汪容与红军代表朱瑞,在固原西北的杨朗镇签订了“停止内战,抗日救国”

^①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3),第 192 页,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协定,宣告骑兵第6师与红军结成“亲密的联盟”。骑兵第6师向红军作出了“不受命进攻红军;事先向红军通报行动及骑兵师位置,以免误会;万一须敷衍,则不打或不作杀伤射击,不前进”等四项保证。^①9月22日,毛泽东代表中国工农红军,张学良代表东北军,分别在《抗日救国协定》上签字。至此,红军与东北军的联合更加巩固了。

以杨虎城为首的第17路军,也不断与中国共产党及红军接触。杨虎城早在北伐战争期后即与共产党人有所交往和合作。1933年在陕南与红军第四方面军达成互不侵犯、互派代表的协议。直罗镇战役后,毛泽东派遣曾在第17军做过地下工作的红军第26军政委汪锋赴西安,向杨虎城转交自己的亲笔信,杨对信中提出的西北大联合、共同抗日的主张,表示赞同。1936年春,由杨虎城资助去德国留学的王炳南回国后,被派到杨部作联络工作。经过多方面的工作,1936年5月,双方商定:红军与第17军各守原防,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密切联系;共同为抗日进行准备工作。^②之后,双方的敌对状态逐渐停止,红军的秘密交通站、运输站,在杨虎城部队的掩护下,于西安、鹿县等地建立起来。双方逐步走上了联合抗日的道路。

张学良、杨虎城在分别与中国共产党进行联络的同时,由于共同的命运、处境和共产党人的促进,他们之间也逐渐消除了隔阂,增进了友谊,两军关系逐步改善。最后,张、杨两将军坦诚相见,倾吐真言,成为挚友。1936年10月,毛泽东等40多名红军将领写信给国民党在西北的将领,提出:“红军誓与你们合作到底。”^③第

① 《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第72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② 罗瑞卿、吕正操、王炳南:《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第19页,人民出版社出版。

③ 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7册,第436页。

一次公开称国民党军为友军。至此,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支西北地区的主要抗日力量的联合确立。它的确立,为国共两党的再度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三、绥远抗战

绥远位于内蒙西部,东临察哈尔,南界晋陕两省北部,西南与宁夏、甘肃相连接。在日本实行大陆政策的过程中,侵夺绥远是其重要一步。控制了绥远,有助于对华北、西北构成外线包围态势,从察绥而南,入侵冀、晋、陕等省,是日军进攻中国的理想通道。绥远的得失对中日双方来说,战略影响十分重大。

1936年11月初,日本关东军和伪蒙古军副总司令李守信、伪“大汉义军”总司令王英及德王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以李守信、王英两部进攻绥远。11月14日,王英伪军主力从商都倾巢而出,全力西犯,向红格尔图方向推进。15日,王英部1500余人开始向红格尔图猛攻。驻守绥远的傅作义部英勇抵抗,击退了伪军的多次进攻。18日凌晨,绥远驻军在董其武的率领下,向伪军发起全线进攻。至当日8时半,绥远驻军骑1师师部胜利进入红格尔图。此役击毙敌军500余人,俘敌20余人,连同保卫红格尔图三天之战,共毙敌1000余人。^①在红格尔图激战的同时,驻守兴和的晋军李服膺部一个团,在17日至18日与敌展开了攻防战,至18日中午终于将敌击退,20日敌全部退出兴和。

红格尔图之战获胜的当晚,傅作义决心先发制人,立即发起百灵庙战役。蒋介石也于11月16日从洛阳致电阎锡山:“应即令傅作义主席向百灵庙积极占领,对商都亦可相机进取,对外交决无顾虑,不必犹豫,以弟之意,非于此时乘机占领百灵庙与商都,则绥

^① 傅作义:《绥战经过详记》,《军事杂志》第100期。

远不能安定也。”^① 于是,进攻百灵庙之战的直接准备开始了。傅作义在11月18日上午于集宁发出电令,命令预定使用于百灵庙方向的各部队开始行动,11月20日,傅作义在归绥召集骑2师师长孙长胜、步211旅旅长孙兰峰及参谋长袁庆荣,部署作战事宜。要求在24日前“以最迅疾动作,敏快手段,于增援之敌到庙之前,袭取成功,期能各个灭敌”。^② 至22日晚10时,绥远各部队按指定地点集结完毕。24日凌晨1时,环绕百灵庙的山中,敌我两军展开全面激战。绥远军分成左右纵队向前推进,伪军则组织猛烈炮火阻挡绥远军队前进。经过反复拼杀,4时以后,绥军已进至山之内线,向敌军主力主阵地发动进攻,战斗更趋激烈,敌据工事顽抗,战局进入苦战状态。上午7时,天色已亮,战斗更烈。绥军拼力进攻,敌亦死守。

鉴于天色已明,绥军若再无进展,敌机将飞来助战,敌援兵也会接踵而至,使绥军陷入不利的境地。孙长胜、孙兰峰当即在战地发出“在拂晓前全歼百灵庙之敌,一举收复百灵庙”的突击命令。孙兰峰亲赴第一线指挥作战,各路纵队密切协同,向敌发起总攻。经过反复搏杀,绥军终于突破敌阵,冲入庙内,与敌展开巷战。至24日上午9时半,伪蒙军大部被歼,绥军收复了百灵庙。是役,“伪军伤亡7800人,(被)俘虏300余人,(绥军)夺获炮3门、重机枪5挺、步枪400余支、电台3架”,^③还缴获弹药一批,面粉两万余袋和大量汽油。绥军以伤亡官兵300余人的代价,取得了战役的全胜。

百灵庙收复后,为了部署歼击反攻之敌和进攻锡拉木楞庙之

①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第681页。

② 傅作义:《绥战经过详记》,《军事杂志》第101期。

③ 《傅作义致蒋介石电》(1936年11月24日),《绥远抗战实录》第6页。

战,11月28日,傅作义、晋军王靖国和骑兵军司令官赵承绶在归绥进行会商,决定集中绥军主力,予以各个击破,以实现既歼灭敌军,又保卫百灵庙和攻占大庙的目的。12月3日至4日,防守百灵庙的绥军粉碎了敌军的反攻,毙敌“大汉义军”副司令雷中田及伪军500余人。与此同时,中国守军骑兵第2师与王英骑兵展开激战。至3日晨,骑2师将敌击溃。从百灵庙败退之敌残余和王英伪军退居于乌兰花以北草地附近,给绥军围困敌军创造了有利战机。12月9日上午,傅作义部李思温团进占锡拉木楞庙。

绥远抗战,历时数月,前后共歼灭和瓦解伪军1个步兵师、2个步兵旅和2个骑步旅,收复了百灵庙、锡拉木楞庙等战略要点多处,肃清了绥远境内的伪军,挫败了日军西侵绥远,妄图建立“蒙古帝国”的阴谋,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爱国抗战热情,增强了晋绥军、第29军、东北军等地方实力派的抗战信心,也有力地推动了国民政府走向对日抗战的道路。

四、蒙古族抗日斗争的开展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给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各少数民族,尤其是北方的蒙、朝、满各族人民的抗日斗争,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一直不断,至华北事变前后,更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展。

散居在东北、察哈尔、绥远等地的蒙古族人民,不甘受日本侵略者铁蹄的蹂躏,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早在日军铁蹄刚刚踏进东北之际,辽西、辽北一带蒙汉两族人民,即于1931年10月,组成东北抗日军蒙边骑兵,1932年后划归东北义勇军第5军区,人数发展至数万人。1932年在绥远成立的有蒙汉各阶层人民参加的反帝大同盟,积极组织了蒙汉各族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接着,在热河、察哈尔等地区成立了蒙汉抗日同盟会、救民抗日会和抗日十人团等组织,从事抗日宣传鼓动工作。1933年2月,中国共产

党人在热河、辽宁一带领导成立了蒙汉抗日同盟军军事委员会,并发表宣言,号召建立抗日武装。蒙汉人民纷纷响应号召,组织蒙汉同盟军,在热河前线英勇抗击日伪军的进攻。5月,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

华北事变发生后,日本加紧策动绥远百灵庙地区德王投靠日本,策划内蒙“独立”。1936年2月12日,伪“蒙古军总司令部”宣告成立,德王公开背叛祖国,走上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道路。21日夜蒙政会驻百灵庙保安队的官兵,在中国共产党长期的政治影响下,由保安处科长云继先等率领1000多名官兵,发动了著名的百灵庙起义。起义者兵分五路行动:第一路打开仓库,夺取武器;第二路袭击稽查处,打死主任李凤城,打开看守所,释放被关押的士兵;第三路攻占保安处干部训练班,解除德王乌溆守备队教官和学生的武装;第四路捣毁电台,切断百灵庙与苏尼特右旗德王的通讯联络;第五路包围留在百灵庙的德王的顾问敖云章等重要职员住处,缴获他们的枪枝,并往会计科,打开银柜,焚烧帐目。行动任务完成后,暴动人员最后在百灵庙南营盘集合,“听候中央及地方当局之援助”。^①由于起义爆发后,乌兰夫等共产党员进入起义部队继续领导斗争,因此绥远国民党当局不愿意蒙汉人民直接起来抗日。当起义部队冲出百灵庙后,他们调集兵力包围和解除了这支部队的武装,后来又用威胁和利诱等种种手段,控制了一部分起义人员,制造了内部的分化和瓦解。百灵庙蒙政会保安队武装实行倒戈,冲出百灵庙,给予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蒙古族王公追随者一次严重打击,粉碎了他们的“高度自治”计划,打乱了日本侵入内蒙西部地区的部署。一些蒙古族王公也纷纷提高了觉悟。当时“每日有日本汽车数辆往来不绝,向索王并其他王公游说,劝其加

^① 《蒙古“自治运动”始末》,第115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第一编 日本侵华与中国的局部抗战

入伪满州国,但内蒙王公中已有不少知觉,故日本对蒙古王公之煽动,一时颇难发生效力”。^①

百灵庙起义激发了内蒙广大人民的抗日斗志,打击了内蒙上层统治者中的亲日分子。6月,中国共产党在伊克昭盟成立了蒙古工委,展开抗日宣传,武装农牧民群众,争取了大部分蒙古族上层人物同情抗日。伊盟的王公和伪蒙军中一些军官表示支持抗日。不久在鄂尔多斯草原上建立了不少蒙汉抗日游击队,成立了蒙汉游击司令部,对日展开武装斗争。9月,伪蒙古军编成后,德王为向日本宣扬蒙古军的“武功”,举行阅兵典礼,引起蒙古族人民强烈不满和反对。当他下令在锡盟各旗强行征兵时,乌珠穆沁右旗保安队官青阿、敖恒等人号召全旗牧民起来进行抵制,并且宣传说:“现在蒙古军政府向我旗征兵要马,是我旗协理托克托胡勾通德王、吴鹤龄等投靠日本扩编军队所致,我们应当反对。”^② 号召被征的牧民起来杀死托克托胡。托克托胡闻风而逃,德王再一次遭到广大蒙古族人民的痛击。12月,在傅作义部队收复百灵庙的战斗中,伪蒙军20余名官兵在战场上起义,调转枪口打击敌人。

第三节 全面抗战的准备

一、西安事变

在张学良、杨虎城以抗日大局为重,与红军实行停战、合作,逐步实现西北地区抗日力量大联合的同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

^① 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蒙古“自治运动”始末》,第137页。

国民政府,却与全国人民的愿望相反,一意孤行,继续调集重兵入陕,并逼迫张、杨“剿共”。

蒋介石平息两广事变后,1936年10月下旬匆忙赶到西安,召见张、杨,向他们宣布“剿共”计划,要他们迅速向陕北红军进攻。但张、杨不仅不听指挥,反而要求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①27日,蒋介石为动员下级军官,特意到王曲军官训练团讲话,声称:“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为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很远,为害尚缓。”声称对“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者,一定“要予以制裁”。^②蒋介石在威逼张、杨的同时,加紧了军事部署,把解决两广事变的嫡系精锐部队30个师,全部调到潼关以东地区,把惟一的--支装甲部队放在豫西。下令扩建西安、兰州机场,集中100架飞机待命,调蒋鼎文、卫立煌等20多名高级军政人员到西安。一切部署妥当后,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再赴西安,以临潼华清池为“行辕”,约集秦陇围攻红军的诸将领,按日接见,咨询情况,面授机宜,扬言将于一个月内完全消灭红军。蒋介石威胁张、杨:若违抗“剿共”命令,将给以“相当的处置”;东北军和第17路军如不全部开赴陕甘前线对红军作战,则将分别被调往闽、皖,由中央军进驻西北“剿共”。张、杨既不愿与红军再开战端,亦不愿离开西北而为蒋介石所改编、吞并。在进退两难的情况下,张、杨深切认识到,蒋介石的“主张和决心,用口头或当面的劝谏,是决不能改变的”,^③遂毅然采取了非常措施实行兵谏,逼蒋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12月12日拂晓,在张、杨的共同指挥下,东北军派兵包围了华清池,迅速解除了蒋介石卫兵的武装,将蒋介石扣留,并移送西

① 《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第28页。

② 《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第11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③ 《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第123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安新城大楼。与此同时,第17路军解除了中央宪兵第2团、省公安局、警察大队等军警机构的武装,接管了飞机场,将陈诚、蒋鼎文、卫立煌等10多名军政大员拘捕。张、杨并于当日发出关于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提出:(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2)停止一切内战;(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4)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等一切政治自由;(7)确实遵行总理遗嘱;(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①此即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张、杨随即采取了一系列重大军政措施:邀请中共派代表参加谈判;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组织以张、杨为正副主任委员的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释放西安的政治犯等。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应张、杨要求,立即派周恩来率秦邦宪、叶剑英等参加在西安的谈判。19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联名发表通电,坚决支持张、杨的抗日主张,提出了“团结全国,反对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基本纲领。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电示周恩来以“扶助左派,争取中间派,打倒右派,变内战为抗战”的策略,“争取蒋介石、陈诚等与之开诚谈判”,并在其对和平解决的条件有相当保证时,采取“恢复蒋介石之自由”的行动方针。^②

西安事变的爆发,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全国各界人士对张、杨的爱国行动给予了广泛的支持和同情。事变发生后三天内,仅山西、湖南、贵州、四川、广西五省的民众团体和救亡组织,发到西安响应张、杨通电的电报就有一千数百件。各国和国内各派政治势力由于立场、利益和认识不同,对事变采取不同的态度,

① 《西安事变资料》,第3—4页。

② 《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第166页。

提出了不同的主张,呈现出一种极为错综复杂而又紧张的局势。国际上,日本政府表示,南京若与西安妥协,联共抗日,则将“强硬反对”,“断然抨击”;苏联虽支持和平解决事变,但却认为张、杨的行动对日本方面有利,不支持西安事变;英美则主张蒋介石与张、杨妥协,和平解决事变。国内各地方实力派对事变反应不一,如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于16日通电全国,对张、杨表示支持,并反对内战;四川刘湘、云南龙云等则对张、杨的行动表示反对,15日龙云发出致南京政府及军委会电,表示要“讨灭国贼,营救委座”。^①

南京国民政府在经过短暂的混乱后,以宋子文、宋美龄等为代表的主和派压倒了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代表的讨伐派,南京当局遂采用“正面处置严正,营救则多方运用”的原则。^②23日、24日,在西安的宋子文、宋美龄代表蒋介石与张学良、杨虎城正式谈判。中共全权代表周恩来参加了谈判,并会见了蒋介石。最后双方达成了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等六项协议,蒋介石承诺停止内战,联共抗日。12月25日,蒋介石由张学良陪同,经洛阳飞回南京。西安事变得到了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标志着十年内战基本结束,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团结御侮,创造了必要的前提。

二、南京政府制定抗日军事战略

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由坚持“攘外必先安内”错误政策向团结抗日转变,其国防准备也迈出比较实际的步伐,并从军事战略的高度全盘考虑未来对日作战计划。

^① 《西安事变资料》,第253页,第75页。

^② 《西安事变资料》,第253页,第75页。

南京政府的抗日军事战略有一个酝酿和形成的过程。九一八事变后,国内的有识之士和国民党开始了对抗日战略的思考。提出持久战思想较早的是蒋百里,他认为制胜日本的惟一方法,“即是事事与之相反:彼利速战,我持之以久,使其疲惫;彼之武力中心在第一线,我则置之第二线,使其一时有力无处用”。^①傅斯年也撰文提出:“中国在开战之初,不能打胜日本,却可以长久支持,支持愈久,对我们越有利。”^②著名地理学家丁文江在1934年撰文疾呼:“华北是我们的乌克兰,湖南、四川、江西是我们的乌拉尔,云南、贵州是我们的堪察加……大家准备到堪察加去。”^③主张向内地退兵,退到西南去,利用西南优越的地理条件,坚持长期抗战。这一时期,青年党也呼吁“万一变乱扩大,政府可迁西部高原,以最大决心作持久殊死战”。^④然而华北事变前,蒋介石忙于进行反共军事“围剿”,对上述主张和呼吁置若罔闻。

华北事变的发生,震动了中国社会各阶层,严重威胁着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国民党内各派系在对日问题上开始作长远考虑。蒋介石在1935年春夏视察了西南,计划在国防较为安全的内地建立新的工业基地,以作为支持战时经济的战略后方。蒋介石曾回忆说:在1935年,“就预先想定以四川作为国民政府的基础。”^⑤桂系李宗仁于1936年4月在广州对记者谈话中提出了“焦土抗战”思想,主张“发动整个民族解放战争,本宁愿全国化为焦土,亦

① 王冉之:《蒋百里将军与其军事思想》,第七章,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

② 《独立评论》1932年8月号。

③ 《大公报》1935年7月21日。

④ 郭衣洞:《中国各党派》,第33页,1947年版。

⑤ 《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1937年11月19日),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4卷,第655页,台湾“中央文物社”1984年10月版。

不屈服之决心,用大刀阔斧来答复侵略者”。^①并在七七事变前对抗日军事战略提出自己的构想。他认为:“中日战争一经爆发,日本利在速战,而中国则以持久战困之:日本利于主力战,而中国则以游击战扰之,日本利在攻占沿海重要都市,而我则利用内陆及坚壁清野之方法以苦之。”^②这些意见为卢沟桥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全面抗战,并对日采取持久消耗战略奠定了基础。

南京政府从1932年开始制定国防计划大纲,具体确定对日作战的战略构想,但真正重视并有所实施却是在1935年后。1935年度《防卫计划纲要(甲案)》指出:“为抵御强暴使敌难达其速战速决之目的起见,集合同军实力坚固占领预定之阵地,以消耗之战略,行逐次之抵抗,将全国形成若干防卫区及核心,俾达长期抗战之要求。”乙案更进一步提出:“为制止敌之蚕食野心,确保我之领土完整起见,应集全国之精锐,于适当地区与敌决战,一举而击破之,先行消灭在长城以内及沿江海之敌势力为要。”^③该年度防卫计划将全国划为三道防卫区域。1936年国防计划大纲草案,将全国分为抗战、警备、绥靖、预备四区,其中抗战有察、绥、冀、晋、鲁、豫、苏、浙、闽、粤十省。指导要领规定“抗战区,不得已时,退至预定最后抵抗线”。另在《国防设施计划纲要草案》中确定“以四川为作战总根据地”,“大江以南以南京、南昌、武昌为作战根据地”,“大江以北以太原、郑州、洛阳、西安、汉口为作战根据地”。^④

1937年1月,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在本年度的作战计划中,设想了中日战争可能发生的三处战场,拟定了抗击日军侵略的具体

① 李宗仁:《焦土抗战的理论与实践》,第1~2页、11页。

② 李宗仁:《焦土抗战的理论与实践》,第1~2页、11页。

③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④ 《民国二十五年度国防计划大纲草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战斗计划。作战计划甲案称：“为维持国家之独立，民族之生存，应先使现驻各地区之部队极力拒止敌人于沿海岸及平津以东、张家口以北之地区”，“尤以长江之封锁及陇海东端之布防并晋鲁两大国防支撑点之编成最为紧要”，“于主防御线之全线上采取常山蛇式之决战防御，使敌不能集结兵力，企图突破我主防御线之任一点”。^① 作战计划乙案认为我军须“于开战初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于规定同一时间内，将敌在我国非法所强占各根据地之实力扑灭之，并在山东半岛经海州及长江下游至杭州湾以南沿海岸，应根本扑灭敌军登陆企图。在华北一带地区应击攘敌人于长城以北之线，并乘好机，以主力侵入黑山白水之间，采积极行动，而将敌陆军主力歼灭之。”^② 甲乙两案的基本意图是北面拒止日军于长城以北，东面拒止于平津以东，在沿海则防止日军登陆，并摧毁日租界内之日军根据地，利用时机反攻东北。

因此，华北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在对日作战上是有所考虑和筹划的，其抗日军事战略也随着日本压迫的加紧而日益明朗。

三、加紧国防建设

面对日本的步步进逼，为改变不堪一击的中国国防状况，在全国人民抗日运动的推动下，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加强国防建设。蒋介石首先命令参谋本部次长贺耀组整顿江海防要塞，要求“宁镇澄淞各要塞急应修备”，“对于各要塞之修正与改良，以及镇海要塞与海州地区皆须积极筹务，分期完成”。^③ 1932年10月5日，蒋介石

① 《民国二十六年度作战计划》（甲、乙、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民国二十六年度作战计划》（甲、乙、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③ 《蒋介石对国防计划及各地工事设施指示文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

石又命令军委会务必于 40 个月内完成要塞整理工作。是年 12 月,军事委员会城塞组成立,统筹修理各要塞和国防工事,并聘请在华的德国军事顾问参与协助。然而 1935 年底以前,南京国民政府国防建设大多停留在计划和口头上,绝大部分未付诸实施,仅主要整理修缮了原有江海防要塞。

华北事变后,日本侵华步伐骤然加快,中国工农红军被国民党军队迫击转移到西北一隅,国民党自认为心腹之患被解除,遂加紧国防建设,开始投入一定力量。1935 年,南京政府开始按照国防线与防区设想构筑国防工事。是年冬,蒋介石调集 4 个师秘密构筑苏州、常熟、嘉兴、江阴等地国防工事。

国防工事构筑与防区划分、战场建设密切相关。当时的国防工事,根据不同情况分为三种:永久性工事系用钢筋混凝土构筑而成;半永久性工事系用铁轨、枕木构筑而成;临时工事则由轻易材料临时构筑。还有的只备置建筑材料,暂不动工。国防工事的构筑程度是以“首都为中心,逐次向国境线推进”。^①

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构筑的国防工事,分沿海与内陆两部分,其分布特点是以首都南京为中心,首先布署沿海和黄河沿线,其次为黄河以北各战略要地。沿海与长江方面,南京政府陆续整修和加强在虎门、厦门、马尾、连云港、江阴、镇江、南京等处的江海防工事。其整理主要内容有:配属高射炮及高射机关枪;整理要塞守备队;构筑要塞之近战永久工事及各种障碍物;配置水雷;设置游动重炮阵地等等。^②至 1937 年上半年,全国共有南京、镇江、江阴、宁波、虎门、马尾、厦门、南通、连云港等九个要塞区整建完

① 《何应钦部长对五届三中全会军事报告》(1937 年 2 月),载《何上将抗战期间军事报告》,台湾文星书店,1962 年版。

②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 364~365 页。

第一编 日本侵华与中国的局部抗战

毕,拥有炮台 41 座,各种要塞炮 273 门。^① 长江中游之要塞及守备区工程进展不快。此外,为加强长江要塞防御,南京政府从九一八以后便开始建造 300 吨左右的江防炮艇。至 1934 年分别建成江宁、海宁、抚宁、绥宁、肃宁、威宁、崇宁、义宁、正宁、长宁等 10 艘,用于长江布雷及防御。

在内陆方面,南京政府计划在察、绥、冀、晋、鲁、豫、苏、浙、闽、粤十省重要地点构筑工事,但大多数工事建在南京周围及邻近各省市。1934 年春,宁、镇、乍淞浦要塞区步兵永久性工事开工,同年底完成。1935 年,南京香虎阵地以及近郊第一期警卫工事开始构筑,并于年底完工。同年夏天,武汉国防工事在陈诚筹划下也开始构筑,沿北面之武胜关、南部之城陵矶到东部之田家镇,修筑一东向的武汉外围国防工事,断断续续地构筑了两年之久,至抗战爆发仍未全部竣工。是年冬季以后,蒋介石又命部队在淞沪外围各要点如龙华、徐家汇、虹桥、北新泾、真如、南新村、闸北车站、江湾、庙行、大场等地秘密构筑防御工事。

1936 年春季前后,国防工事建设全面展开,此年国防建设费也从每年的 1 400 万元猛增到 3 000 万元。构筑工事计有河南的焦作、博爱、沁阳、道口、修武、巩县、洛阳、开封、兰考、郑州、归德、亳县各区工事;南京东南正面主阵地、南京长江渡河点暨城厢警卫与各地下室工事;宁镇澄要塞工程的步兵工事;镇江、芜湖、江西北岸各区警卫阵地;吴福线主阵地工事;锡澄线核心步兵工事和后方地带工事;杭州湾、镇海至象山港之海岸工事;淮海区之海州、徐州、清江浦、蚌埠、鲁南各工事。^② 1937 年 6 月,又于沧县、保定、德县、石家庄等地构筑国防工事。到 1937 年 3 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

① 《全国要塞现况一览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

② 《陆军沿革史草稿》第一章第三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

会前,南京政府在江浙区、山东区鲁南阵地和河南区实际构筑工事3512个,其中江浙区即占2264个,约占65%。^①迄止七七事变前,江浙、山东、河南、晋绥、冀察各区第一期国防工事基本完成,其中南京、淞沪的外围阵地,吴福、锡澄、乍平嘉、乍平甬、鲁南、豫北、豫东、沧保德石、娘子关巨雁门内长城国防工事均具相当规模。

南京国民政府加紧国防建设的另一项内容是国防工业建设,它是国防准备的物质基础。抗战前中国工业尤其是重工业极为落后,几乎谈不上自成体系的国防工业,为应付日本的侵略,南京国民政府在兵工生产方面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首先,为防止战争爆发时,兵工企业沦于敌手,国民党着手停办和迁移几家可能受到战争波及的兵工厂。一二八事变后,南京政府即决定迁移上海兵工厂于杭州。而后又决定将上海、华阴、开封、德州、大沽等兵工厂停办,机器分运金陵、巩县、济南和汉阳兵工厂。原拟在江苏无锡设立的化学厂也为防敌袭击而改建于巩县,更名为巩县兵工分厂,1936年完成建厂。1935年后,南京政府又决定将兵工厂向川黔转移。是年6月5日,蒋介石指示兵工署长俞大维:“凡各兵工厂尚未装成之机器,应暂停止,尽量设法改运于川黔两厂,并须秘密陆续运输,不露形迹。”^②这个迁移计划至抗战爆发尚未完成。

其次,在对第一线兵工厂停办和内迁的同时,南京政府加紧对天水、太原、四川、广东、福建等地兵工厂进行清理整顿,西安、南昌、株州等地兵工厂和火药厂则扩大生产规模,加速生产和仿制兵器。1935年,巩县兵工厂仿照制造出德国1924式毛瑟枪,定名为中正式,并正式成批生产;金陵兵工厂仿制出马克沁重机枪。至抗

① 据何应钦:《何上将抗战期间军事报告》中《对五届三中全会军事报告》一文数字计算所得。

②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稿——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第338页。

第一编 日本侵华与中国的局部抗战

战前夕,全国几家主要兵工厂的生产概况如下(只举主要产品):金陵兵工厂,年产迫击炮 180 门,手提机枪 385 挺,月产马克沁重机枪 33 挺;上海兵工厂,月产七五山炮 6 门,七九机枪子弹、六五步枪子弹 240 万发;汉阳兵工厂,月产七五山炮 2 门,八八式步枪 4 700 支,三十节式重机枪 35 挺;巩县兵工厂,年产中正式步枪 5 万支,月产元年式步枪 3 120 支,捷克式轻机枪 25 挺;汉阳火药厂,月产枪药 30 吨。^① 这些数字,未必精确,但大致反映了抗战前夕中国兵工生产的水平与特点,这就是轻型武器生产具有一定规模,而重武器尚远不足。

南京政府的国防建设虽然计划周密,但进展缓慢,成效有限。南京政府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从九一八、一二八、长城抗战直至华北事变,对日一味妥协,甚至不惜签订卖国协定,极大地影响了对日国防准备。到了西安事变以后,日本全面侵华已迫在眉睫,南京政府始倾力突击准备国防,赶筑国防工事,惜已为时嫌晚。况且已完成的国防设施管理混乱,军事训练极少,未能达到战备的要求。尽管如此,南京政府毕竟在准备抵抗侵略上迈出了第一步,在后来的抗战中,国防工事等国防建设项目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如沧、保、德、石和鲁南阵地,即在后来的平汉路、津浦路北段抵御日军和台儿庄会战中发挥了不同程度的积极作用。抗战前南京政府的国防准备为中国对日正面战场的前期作战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四、整编军队

国防准备的基础是军队。但 30 年代的中国军队,正如陈诚所

^① 见《抗战中的兵工生产》附表 4,载台湾《抗战胜利四十周年论文集》(上)第 1053~1056 页。

说:“以之内哄则有余,以之御侮则不足。”^① 要对日作战,必须对原有庞大、混杂的军队加以整顿。1933 年秋天,德国将军冯·塞克特来华访问考察后,向蒋介石提交了一份《陆军改革建议书》。他认为,中国军队的最大弊病是多而杂,因而“目前必须达到的目标是大量减少常备正规军,而以一支小型配备精良、士气高昂、战斗效率锐利的军队取代一群既无良好武器装备又无严格训练的乌合之众”。^② 他建议中国军队编为 60 个师,并成立一个教导总队,训练在职军官,使他们具备相当军事技能和指挥现代化战争的经验,以提高军队整体作战能力。蒋介石接受了塞克特的建议,在德国军事顾问的帮助下,着手整编中国军队。

1934 年 12 月,蒋介石制定整军计划,将全国军队编成 60 个师,“暂定三年至四年编练完成”,^③ 1935 年编练 6 至 10 个师,1936 年编练 16 或 20 个师,1937 年编练 20 至 30 个师。根据编制原则,每师改为四团制编制。中央军与东北军先行编练。为避世人耳目,不特别设置整军机关,只在武汉总部或南昌行营下附设督练处或编练处,以武汉为第一编练处,编练鄂豫皖未参加“进剿”工农红军的部队;以南昌为第二编练处,编练赣浙闽地区部队。^④

1935 年 1 月 26 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全国军事整理会议,布置整军工作。3 月 1 日,陆军处在武昌成立,陈诚为处长。同月,法肯豪森将军担任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总顾问。蒋介石向德国请求“向我提供德国在军事和军事技术方面的丰富经验”,帮助南京政府建立一支现代化的武装力量,并“在组织、训练、武器和装备

① 《陈诚人回忆资料》,载《民国档案》1987 年第 1 期。

② 《德国外交档案中之中德关系》,载《传记文学》第 41 卷 6 期第 116~123 页。

③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第 323~324 页。

④ 《战前的陆军整编》,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抗战前十年国家建设史会论文集》(下册)。

新的中国军队上立足德国的体系”。^①法肯豪森领导下的顾问团满足了蒋的请求,在中国整军备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德国军事顾问对中国军队采用德式训练方法,装备德国武器。在佛采尔将军将蒋介石嫡系部队第88师训练成为教导师之后,德国顾问又陆续将中央军第87师、第36师、第5军及桂永清的教导总队等“于短期内练成新式劲旅”。^②至全面抗战前,全国接受德国顾问训练并配以德式装备的部队总计约有19个陆军师,达30万人。^③

1935年夏,蒋介石又令全国炮、骑、工兵均归陈诚督导整理,并于此年下半年开始第一期10个师的整编。这次整编,只在编制上作些调整、充实,武器装备基本仍旧。第一、二期共整编20个师,均在1936年完成,第三期整编10个师也在七七事变前基本完成,但原拟1937年上半年10个师,下半年10个师的整编计划未能实现,即全面抗战发生。60个整军计划,仅成其半,即告终止。迄七七事变前夕,南京国民政府辖整编步兵182个师,46个独立旅,骑兵9个师又6个独立旅,炮兵4个旅又20个独立团,共约170万人,预定使用第一线作战者,计步兵80个师及9个独立旅,骑兵9个师,炮兵2个旅及10个团。^④

同时,鉴于外祸日亟,南京政府加紧推行征兵制度。1933年6月,南京政府公布《兵役法》,但未马上实行。至1936年,军政部加紧推行征兵制度,颁布《兵役法施行暂行条例》、《兵役及龄男子调查规则》、《陆军征募事宜暂行规则》及其它各项兵役法规,正式推行《兵役法》,从7月至12月共征集入营新兵50000人,受到军事

① 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③ 王正华:《抗战时期外国对华军事援助》,第67页,台北环球书局1987年4月版。

④ 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第3-4页。

训练的壮丁 50 余万,正在训练的约百万人,“以为征集现役兵之准备”。

中国空军实力在抗战前也有一定提高。1936 年夏天,两广事变发生,广东军阀陈济棠的空军为蒋收买,国民党空军统一告成。同年为蒋介石五十寿辰而在全中国掀起“购机祝寿”活动。在这外患严重的关头,各地及海外华侨热烈响应,截止 10 月下旬,各地共捐献 470 万元,^① 购得飞机 68 架。^② 1937 年 5 月,南京政府将全国划为 6 个空军区,实际上成立的有南京和南昌空军区司令部。七七事变前夕,全国空军总计有飞机 600 余架,作战飞机 305 架。^③

国民党海军共有 3 个舰队,大小舰艇百余艘,但总吨位只约有 6 万余吨,^④ 难以担负捍卫海防之责,只能谋求巩固江防。

经过整编,中国军队尤其是陆军的战斗力有所变化。后来美国著名记者斯诺评价说,在 1937 年陆军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最强的军队。^⑤ 尽管如此,在 170 余万常备陆军中,各部队的系统、装备、编制各不统一,所以很难相互配合及协同作战。

五、交通事业的发展

交通运输在战时具有重要的战略功能。随着日本侵略的加深,南京国民政府明显认识到交通备战的重要性,认为战争的准备,是整个国力的动员,而“此种国力之动员 与其利用,则非交通莫属”。^⑥ 1934 年国民政府德国军事总顾问冯·塞克特向蒋介石建

①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 281 页。

② [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 10 册,第 126 页。

③ 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第 4 页。

④ 蒋纬国:《抗日御侮》,第 1 卷,第 122 页。

⑤ 斯诺:《为亚洲而战》,载《斯诺文集》,第 3 册,第 27 页,新华出版社 1984 年 8 月版。

⑥ 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议,“独立地与有效地生产自己的武器以及发展具有战略性的交通系统,在日本入侵时,可以迅速地输送部队至危急之地区,实为当前首要之务”。^① 在 1935 年召开的国民党五全大会上,也提出了交通准备问题,认为“值此中日战祸一触即发之秋,沿江沿海,随时有被封锁之虞,交通关系国防至巨”。^② 南京因此加紧了赶筑铁路等交通设施的步伐。

铁路位居交通之首,铁路的备战就成为交通备战中的头等大事。中国的铁路始于晚清,迄九一八事变时,全国通车里程仅为 14 441 公里,^③ 且布局十分不合理,大都分布在东北及长江以北和沿海地区,而长江以南仅有不成系统的局部铁路,西南西北铁路更为稀有,桂、川、黔等省竟无一里干线铁路。华北事变发生后,中国的铁路建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景象,旨在扭转畸形的铁路布局。这些工程大多集中在长江以南,“以国防运输及沟通经济中心为原则,使之成为全国交通干线”。^④

从 1935 年开始,南京国民政府从京沪铁路的苏州站修建一条长约 72.4 公里的铁路,到沪杭铁路的嘉兴站,翌年 7 月完工。它的建成可不经过上海就把京沪国防阵地和沪杭甬国防阵地连成一片,对战时淞沪战场的调兵很方便。粤汉铁路是贯通华中与华南的命脉,但多年来,株州至韶关间 456 公里的路轨一直未能建成,1930 年开始动工兴建了韶关至乐昌段,1935 年至 1936 年 5 月,株州至乐昌接轨通车,使粤汉、平汉两铁路连成一线。该铁路在抗战时期武汉、广州失陷之前发挥了重大作用。中国从国外购买的全

① 《近代中国》第 45 期,第 122 页,近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②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 384 页。

③ 国民政府交通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④ 《革命文献》,第 78 辑,第 256 页。

部兵器、弹药、器材,主要取道香港通过粤汉铁路运往前线,共计运送上兵达 200 余万,物资 54 万吨。^① 1937 年 7 月,陇海铁路从西安延伸到宝鸡共 170.5 公里。同年 9 月,浙赣铁路从玉山至南昌,南昌至萍乡接轨通车,共 533.5 公里。这两条铁路对西北和东南地区的军事运输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具有较大的国防价值。另外,还修筑了同蒲铁路风陵渡至太原段 452 公里,大同至太原段 350.4 公里,平遥至汾阳支线 33 公里,原平至阳明堡支线 35 公里,道清铁路道口至楚旺段 65.5 公里;京赣铁路宣城至歙县段 159.4 公里,陈营至贵溪段 49.6 公里;沪杭甬铁路闸口至百官段 77 公里,都具有较大的军事价值。据统计,九一八后至七七事变前,南京政府新筑铁路里程达 3 150 公里。^② 此外,还修建了南京轮渡和钱塘江大桥,使津浦、京沪杭甬、浙赣诸铁路连成一线。

在修筑新路的同时,国民政府铁道部还对旧有铁路进行了改造。1935 年,铁道部通令各铁路管理局,“对于人力、物力、各项设备加紧准备,期于战事爆发后可以应付巨艰”。^③ 改造的主要内容是更换铁轨、加固桥梁、添购车辆、改善信号系统。铁道部在 1935、1936 年间,从国外添购机车 177 台,客车 163 辆,货车 1328 辆。至 1936 年 5 月,全国共有机车 1 116 辆,货车 14 580 辆,客车 2 090 辆。到抗战前夕的 1937 年 5 月,机车、货车和客车分别又增加了 156 辆、1 762 辆、326 辆。^④

公路建设也有一定的成就。其总长度由 1927 年的 1 000 公

①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第 295 页。

② 俞飞鹏:《十五年来之交通概况》(1946 年 4 月),国民政府交通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③ 国民政府交通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④ 张公权:《抗战前后中国铁路建设的奋斗》,第 122~123 页,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

第一编 日本侵华与中国的局部抗战

里增加到抗战前夕的 109 500 公里,初步形成了全国公路网络,计有京闽桂、京黔滇、京川藏、京陕新、京绥、京鲁、绥川粤、闽湘川、鲁晋宁、浙粤、甘川、陕鄂、川滇等干线 21 条,支线 15 条,它对于抗战初期中国能在较短的时间内集结兵力起着重要的作用。

航空方面,1929 年 1 月,南京政府设立了航空筹委会,依靠外资发展航空事业。至七七事变前,已拥有中国、欧亚、西南等 3 家航空公司,开辟航线 12 条,通航里程约 15 300 余公里。航运方面,由于外国轮船公司几乎垄断了长江和沿海航运,所以我国航运业很不景气。截至 1937 年,中国轮船总吨位约 680 000 吨。^①

六、建设西南西北后方基地

由于战前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重心集中在沿海沿江地区,在日益紧迫的日本侵略面前,开发建设内地,建设西南、西北后方基地,就成为南京国民政府实施抗日军事战略和事关民族存亡的战略性措施。

根据中国的地理态势,地形西高东低,西部多为高原山地,尤其是四川省山河奇伟雄壮,地势险要,气候温和畅适,物产富饶丰盛,人口达 5000 多万,文化根基深厚,是抗战的最好后方。早在 1919 年孙中山制定的《实业计划》中,即强调要注重西北边地的开发。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对后方国防基地的建设有所警觉,提出“基本工业之创办,重大工程之建筑均须择国防后方之安全地带而设置之”的方针。^②

① 陈谦平:《试论抗战以前南京国民政府的交通建设》,载《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档案出版社 1988 年 9 月版。

② 《中国国民党历次会议宣言决议案汇编》第 2 分册,第 247 页,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训练委员会 1941 年编印。

1934年1月,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作出决议,决定将国民经济的中心置于内地,“于经济中心区附近不受外国兵力威胁之区域,确定国防军事中心地。全国大工厂、铁路及电线等项之建设,均应以国防军事计划及国民经济计划为纲领,由政府审定其地点及设备方法”。会议要求全国道路与航路的开辟,应以内地为“织网之中心,尤须着首先完成西向之干路,使吾国于海口外,尚有不受海上敌国封锁之出入口”。^①首次确立了以国防为中心的西南、西北腹地经济建设方针。日本侵略势力伸向华北后,国民党内有人提出以发展西南经济作为“救亡图存之根本大计”^②的主张,朝野各方对于应在什么地区建立后方基地发生争论,“或主张以西北为中心者,或主张以四川为中心者,或主张以汉口为中心者”,争论并无结果。1934年秋冬,国民党军队“追剿”红军进入四川。次年春夏,蒋介石在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等省实际视察。7月,蒋介石作出决定:“对日应以长江以南与平汉铁路以西地区为主要阵线,以洛阳、襄阳、荆州、常德为最后阵线,而以四川、贵州、陕西三省为核心,甘肃、云南为后方。”^③至此,加紧建设西南、西北后方基地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谋求西南政治的统一,是建设后方基地的先决条件。为此,经过南京政府多方努力,1935年2月10日,四川省政府在重庆成立,结束了川境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3月,蒋介石亲自飞往重庆,设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把持了川省军政大权。1937年6月,蒋介石派遣军政部长何应钦入川,召开川军整军会议,达

①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228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0年版。

② 《中国国民党历次会议宣言决议案汇编》第2分册,第201页,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训练委员会1941年编印。

③ 张其昀:《中华民国史纲》,第4册,第211页,台北1964年版。

第一编 日本侵华与中国的局部抗战

成了控制川军武装的预期目标。同时,中央一体化政策也推行到贵州省和云南省。西南政治归于统一。

与此同时,南京国民政府加紧制定计划,促进后方基地的建设。1936年3月,资源委员会制定“重工业五年建设计划”,准备投资27120万元,在内地湖南、湖北、四川、陕西和江西等省兴建冶金、化工、燃料、机械、电气等行业30余个大中型厂矿,并在内地筹建军事工业基地。^①为此,南京政府积极寻求外援。1936年2月,与德国签订了《中德信用借款合同》。合同规定,德国向中国提供一亿金马克的信用贷款,供南京政府在德国购买军火及兵工设备,余下的约10%,即9819114马克用于购买重工业设备,^②并由德国帮助资委会建设钨铁厂和钢铁、电工器材等厂。在1935年11月举行的国民党五全大会上,通过了《西北国防之建设案》。1937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又决定了经济建设五年计划。

建设西南、西北后方基地的成效是有限的,南京政府制定的不少建设计划刚刚展开不久,就由于全面抗战爆发而夭折停止,或大受影响。但是后方基地的建设和筹划,使得中国抗战有了战略的后方和依托,为南京国民政府实施对日战略奠定了基础。

七、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谈判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宣告了十年内战的基本结束,为国共两党的再度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但要实现这一目标,还有着艰难的历程。

1937年2月,中共为了继续推动国民党最高当局走向联共抗日,致书国民党提出了著名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这时,国民党

① 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为商讨西安事变后的国共关系和对日方针,召开了五届三中全会。会议通过了《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提出了解决共产党问题的四项办法,即“彻底取消其所谓红军”;“彻底取消所谓苏维埃政府及其他一切破坏统一之组织”;“根本停止其赤化宣传”;“根本停止阶级斗争”。^① 蒋介石这时坚持“编共而不容共”。^② 实际上在联共问题上处于徘徊之中。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国民党同中共进行了一系列谈判。

从西安事变后到七七事变前,国共间主要进行了三次会谈,即2至3月间的西安谈判,3月下旬至4月初的杭州谈判和6月的第一次庐山谈判。谈判主要围绕军队问题、国共合作形式和政权问题等进行。

首先是军队问题。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非常激烈,争论的焦点是关于红军的编制人数、指挥系统和干部配备等问题,实质是改编还是收编的问题。

西安谈判开始后,蒋介石给其代表顾祝同的谈判原则是:在人数上,只许红军编两师一万五千人;在干部上要求“各师之参谋长与师内各级之副职,自副师长至副排长人员,皆应由中央派充”。^③ 取消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人员,服从国民党一切命令等。很明显这是收编的条件,实质是要红军放弃独立性,成为国民党的附庸,自然为中共所拒绝。

为了使谈判真正获得成果,周恩来于3月下旬赴杭州与蒋介石直接谈判。周明确提出:红军改三师四万余人,并设总指挥部,国民党方面不派副佐及政训人员等。蒋迫于形势表示:中共提出

①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第435页。

② 《蒋总统秘录》,第10册,第192页。

③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第213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的各项均可考虑。但6月中旬,蒋与周在庐山会谈时又一反前态,只允许军队编三师四万五千人,并不同意设某路军总指挥部,而设政训处指挥,并要毛泽东、朱德出洋。这种无理要求被中共所拒绝,直到七七事变爆发时,双方仍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其次是关于两党的合作形式问题。蒋介石为了让共产党失去独立性,绞尽脑汁,恩威并施,最初在杭州谈判时,赞扬中共有民族意识和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所以他个人很希望共产党与他永久合作,并请中共提出一个与他长期合作的办法。^①蒋的用意是不满足于党外合作,想寻求一条更好的溶共办法。根据蒋的提议,中共中央认真起草了一个统一战线纲领,并向国民党建议组织一个包含国共两党和一切赞成这个纲领的党派团体参加的新的民族联盟,毛泽东还尖锐地提出了在联盟中共产党的领导责任。这和蒋的愿望相差甚远。于是,到6月庐山会谈时,蒋的态度便发生了变化,他撇开周恩来带来的按他提议定的共同纲领,提出要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但只能由国共双方参加,对其它党派无合作可言,只能收容;并提出蒋任同盟会主席,有最后决定权,同盟会还可视情况的发展扩大为两党合组的党,并可代替共产党与第三国际发生关系。^②蒋这一提议的实质就是要从组织上控制共产党,使其丧失独立性。中共为顾全大局,同意在确定共同纲领和组织独立、政治批评自由的基础上建立国民革命同盟会,承认蒋依据共同纲领有最后决定权。同时中共还认真起草了同盟会的组织原则与共同纲领,但该文件交蒋后,又是石沉大海。可见蒋在联共问题上一直动摇不定,忧虑重重。

还有一个边区政权问题。双方在西安谈判时曾先商定,陕甘

① 杨奎松:《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载《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3期。

② 参见杨奎松《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一文。

苏区政权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直接受国民政府指导,特区行政人员由地方选举,中央任命,但中共建立独立政权是国民党所极力反对的,遂又提出将陕甘苏区分属各省,人员不经民选,其目的是对苏区实行分割,以削弱共产党的独立地位。杭州谈判时,周恩来明确表示:陕甘宁边区不能分割。蒋则表示希望中共在边区问题上,推荐一南京方面的人来主持。6日蒋再次表示:边区政府人选,由国民党方面派正职长官(可由中共推荐国民党方面人员),边区自选副职。中共遂向蒋推荐张继、宋子文、于右任三人择一任边区行政长官。结果遭蒋反对,而提出由坚定的反共分子丁惟汾任边区长官,被中共断然拒绝。这样直到七七事变时,在边区问题上仍无进展。

从西安事变到七七事变半年多的谈判中,国民党在表面上虽未拒绝联共抗日,但设置了种种障碍,从而使谈判未取得实质性结果。蒋介石之所以在联共问题上忧虑徘徊,其根本原因是对日本还有幻想。他不仅认为中日关系还没有到“最后关头”,而且还“渐信日本已有较具理性的人物当政,其结果或能使狂热分子稍具戒心”。^①由于蒋介石联共主要是为中日关系的恶化作准备,所以只要日本不放弃侵略,他就感到有联共的必要;但只要中日关系还有一线缓和的希望,他就下不了联共的决心。所以直到七七事变前,蒋介石仍不断地劝告日本当局:“错误的道路,走的还不算远”,如能停止进攻,两国关系“当会好转”。^②然而日本并不为所动,正在密谋发动更大规模的侵华行动,这也就必然推动蒋介石加快联共抗日的步伐。

① 《卢沟桥》第14页,前导书局发行1937年9月版。

② 《蒋总统秘录》,第11册,第12页。

第四节 七七事变前的华北局势

一、日本控制华北的企图

西安事变后,中日关系表面上暂显平寂,但平静的背后隐藏着更大的危机。日本加紧了从经济、军事和政治上实际控制华北的步伐。

1937年2月20日,日本外务省制定《第三次处理华北纲要》,明确提出为全面控制华北,“必须全力以赴,进行以华北民众为对象的经济工作”。3月,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闭幕,大会迫于形势,不得不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第二次国共合作趋于实现。为破坏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达到占领华北的实际目的,日本外务、大藏、陆军和海军四大臣会议决定在新形势下采取的对华政策措施,是设法具体促使“南京政权逐渐抛弃容共的依靠欧美的政策,而和帝国接近,特别在华北方面,使其自动地实现对日满华提携互助的各种措施进行合作”。明确规定在新形势下对华北的方针:加紧控制华北的经济命脉,除了对华北政权进行内部争取和抓住不放外,对南京政权采取措施,使该政权实质承认华北的特殊地位;并进而对日满华提携互助的各种措施进行合作。^①

日本加紧掠夺华北经济的具体计划,是要努力完成1936年9月宋哲元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达成的中日经济提携

①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第361—362页,1969年再版本。

八要项中未曾实现的部分,这就是赶筑津石铁路、垄断华北棉业、恢复龙烟铁矿和收买开陞煤炭。关于津石铁路,还在1936年8月31日,由亲日分子潘毓桂任局长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津石路工程局与日本兴中公司驻津理事平山枚三,在天津召开技术会议,决定当年10月动工,来年10月通车,“以便利用此条铁路支配平汉、津浦、正太等路”。^①并直接由天津运兵南下,威胁鲁、豫、晋等省。同时为垄断华北棉业,日人先后组织成立了冀东棉业委员会、秦晋棉业产销合作社等,并通过冀察当局强迫农民种棉。日本华北驻屯军极力要求冀察当局将“宋田协议”付诸实施。

为配合经济上的掠夺,日本加紧了华北特殊化的步伐。一方面壮大华北伪组织的力量。首先扩大已有的伪组织,将冀东伪组织的民政、财政、建设、实业、教育五科改为处,将保安队改成保安旅,其次是制造几个类似冀东伪组织的伪政权,分布于晋、绥、鲁、豫各省内。1937年春,郑州破获日本特务机关收买汉奸、组织伪政权的计划,便是其中一例。在冀察两省,华北驻屯军采用种种方法企图迫使冀察当局宣布脱离南京中央政府,但均遭到拒绝。日军遂收买北洋军阀余孽程国瑞、赵文俊等组织恐怖团体,冒充共产党名义,破坏平汉、津浦等公路交通,扰乱平津治安,制造恐怖气氛,然后借口“防共”,对宋哲元施加压力,逼迫他与日本“携手合作”。1937年2月间天津警署破获的假冒共产党案,便是日本这种企图的例证。

另一方面,日本华北驻屯军日本特务机关加紧对中国第29军进行离间分化,别有用心地将29军分为抗日的中央派与和平的地方派,或拉拢利用,或攻讦诋毁,并收买汉奸窥探29军将领言行,搜集29军部署的情况。然而,冀察当局出于不能沦落为中华民族

^① 公教:《华北的新动态》,《申报周刊》第1卷第36期(1936年9月)。

千古罪人的良心,对日本的阴谋进行了种种抵制,维护了华北的主权,日本企图控制华北的阴谋难以得逞。

日本加快了军事控制华北的行动。日本国内在“佐藤外交”的掩饰下加紧进行战争准备。2月1日,日海军军令部第3部在《综合情报》中要求对既定的对华政策再作研究,准备和战两手,使之万无一失。^①3月上旬,日军参谋本部将驻华武官喜多诚一少将、华北驻屯军参谋和知鹰二中佐和关东军参谋大桥熊三人召回东京汇报华北形势,他们主张“莫如以开战来整顿一切战备和指导适应国际形势的外交”,应“走在对苏行动之前,首先对华一击,挫伤蒋政权的基础”。认为“采取软弱政策的结果,只会使现地形势逐步恶化”。^②3月24日,70艘日本军舰开到中国青岛,准备以中国为假想敌演习沿海登陆作战。4月1日,日本海军派野村勘察天津塘沽港口形势。第二天,日本海军武官又齐集天津会商,议决兴筑塘沽港口,以备开战后运送军队和给养弹药。5月4日,关东军司令官植田在承德召开军事会议。8月,关东军一个旅团开进了毗连河北、平津的热河。从4月25日起,华北驻屯军开始在平津近郊举行战斗演习。6月,这种演习突然频繁起来,尤其是驻丰台的第一联队,竟以攻夺宛平城为目标,不分昼夜地举行演习。据《中国驻屯步兵第一联队战斗详报》记载,驻屯军幕僚大部聚集在一文宇山(即沙岗),对第一队日军进行检阅和现场指导,并派遣部队辅佐官对丰台进行勘察。6月21日,华北驻屯军紧急成立临时作战课。一时间,平津气氛紧张,风声鹤唳。东京私下盛传着:“七夕晚上,华北将重演第二个柳条沟一样的事件。”^③战争的乌云笼罩在

① 《现代史资料·中日战争1》,第420页。

②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1分册,第115~116页。

③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6页。

华北上空。

二、国民政府关于华北问题的方针

国民政府处理华北危机的方针经历了由软弱退让到较为强硬的过程。自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不断向南京国民政府进逼。蒋介石在国难当头与内战不息的情况下,推行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蒋介石同汪精卫合作,由汪精卫主持对日外交,在华北问题上表现了软弱退让,致使华北危机愈显严重。1935年11月,由于汪精卫的被刺,亲日派在国民政府内失势。一方面日本对华工作失去了一个理想的对手,于是他们转而集中力量猛攻宋哲元,企图与华北当局直接交涉,达成华北自治以脱离南京政府的目的,另一方面,南京政府亦开始直接与日人交涉,并对华北问题采取了软中有硬的方针。

鉴于东三省迅速沦陷和华北问题的严重,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遭到了严厉的抨击,如果华北再成为第二个东北,南京政府面临着被全中国人民抗日怒潮推翻的危险。因此,南京国民政府处理华北危机的方针和立场,自始至终非常明确,就是要中央对华北的宗主权,在此基础上同日本进行政治和外交交涉,争取和平解决华北问题。1935年11月20日,蒋介石在会见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时,一改以前的笑脸姿态,驳斥日方观点,宣布华北问题不应只看作地方问题,而应当从整个中日外交出发,解决中日间的一切“悬案”。蒋介石提出了“整个谈判”中日外交的方针,用以抵抗日本以局部事件解决而分裂华北的阴谋。^①遵照这一方针,南京政府外长张群在与日方大使等要员的会谈中亦一再声明:“在进行商讨解决中日双方问题时,双方在华北一切行动务须停止,否

^① 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则,不良影响之所及,一切问题将无从解决。”^①同汪氏在华北问题上软弱退让及其“中央对日交涉难,有整个计划”^②的言论相比较,南京政府处理华北问题的方针有了明显的进步。

与此同时,在华北问题上国民政府对日本也曾一度抱有幻想,期望通过半独立于南京政权的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使日本对华北扩张的企图有所缓和。但1936年1月日本广田三原则的提出,打破了南京政府的幻想。蒋介石和他的幕僚们终于明白:日本的侵略是绝无止境的,在华北问题上南京政府已不能再退让。华北的存亡成了中国对日和战的最后关头。1936年7月,在中日矛盾进一步尖锐化的情势下,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二中全会。会议决定成立以蒋介石为议长的国防会议。会上蒋介石对其在五全大会上提出的“最后关头”作了解释,一是:“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二是在国民党五大后,“如遇有领土主权再被人侵害,如果用尽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这个侵害,就是要危害到我们国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这就是为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到这时,我们一定做最后之牺牲。”但是,他又说:现在“并未到达和平绝望的时期”,“并未达到最后关头”。^③1936年11月,由于成都事件、北海事件及日本向华北大举增兵使得中日间调整关系的谈判趋于破裂。为此,蒋于10日致电国民政府外长张群,训示:“应以完整的华北行政主权为今日调整国交最低之限度,……须知今日完整华北主权,乃为中国生死存亡惟一之关键,……虽至

① 《民国档案》1988年第2期,第23页。

② 《国闻周报》第10卷,第21期。

③ 《国闻周报》第13卷,第28期,1936年7月20日出版

任何牺牲,亦所不恤。”^①

因此,华北主权的得失成为南京国民政府处理华北危机时决定抗战与否的关键,也是国民政府对日妥协的最后一道防线。蒋介石屡次对日本人发出了“最后关头”的警告,但由于对日本还抱有幻想,不敢同日本撕破脸皮,蒋一方面暗示日本不要欺人太甚,一方面为避免刺激日本人,在谈及“最后关头”时把话说得很含糊。面对日本在华北的不断走私和增兵,国民政府认为:“这虽然增加两国交涉的困难,但和平一日不绝望,即外交尚不无运用的余地。”^②对日本仍抱有一定的幻想。然而由于日本的全面侵华政策,中日政治和外交交涉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不以国民政府意志为转移,华北存亡的“最后关头”即将来临。

三、中日政治交涉的失败

国民党五全大会后,本着“一方面固为和平尽最大之努力,一方面亦不辞牺牲作积极之备”^③的精神,为争取时间进行抗战准备,国民党开始同日本进行政治上的直接交涉。

就在五全大会上发表了对外关系的重要演说后不久,蒋介石即令外交部长张群主动向日本提议,举行会谈,商谈调整国交。^④1935年12月,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抵南京与蒋介石晤谈,试探中方态度。12月20日,张群与有吉明在南京会谈。张群向有吉明表示:“年来中日问题未能圆满解决,原因是遇事只能敷衍一时,未作根本的打算。日本没有能认识中国的诚意,中国又感觉日本要

①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第680页。

②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第665页。

③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第663页。

④ 《第二次中日战争史》,第345页。

第一编 日本侵华与中国的局部抗战

求无厌。如果不根本调整两国关系,前途殊堪忧虑。本人愿以最大努力,经由外交途径采用正常办法来商谈中日整个关系之调整。至于用何种方式进行商谈,亦愿交换意见。”^① 针对有吉明关于华北问题仍归华北地方处理的建议,张群表示:“华北为中华民国一部分,一切问题仍须中央整个商谈。”^②

24日至27日,中国驻日代办丁绍仪三次前往日本外务省,将中国政府的提议面告外务次官重光葵,要求明确答复。重光葵表示没有异议,只希望双方造成良好空气,使交涉顺利进行。^③ 自此,中国从不与日本直接交涉到一面交涉、一面抵抗,再进入了主动与日本直接交涉的阶段。

然而,日本亡我之心未改,没有丝毫诚意准备彻底调整中日关系,继续加紧向华北增兵,鼓励走私活动,极力实现华北特殊化。中国方面则采取了相应的应付策略。1936年7月10日,张群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作外交报告,指出:“中日交涉不采取地方交涉的办法,凡两国外交事件,概由两国外交官用外交方式处理。中国政府在处理日本交涉时始终抱定这个方针,并通知地方当局,把所有外交事件,都推到中央来办。”^④ 同时在军事上,中国方面着力进行抗战准备。张群在同日本驻华使馆代办有田八郎会谈时,告诫日本“两国交涉途径,如果能够调整,固然是我们的希望,否则惟有一战以求解决”。^⑤

1936年4月16日,张群和日本驻华使馆秘书须磨会谈,中国方面希望从东北问题谈起,遭到日方拒绝,并提出互惠关税和自由

① 《张群、有吉会谈纪录》,载《民国档案》1988年第2期,第10~24页。

② 《张群、有吉会谈纪录》,载《民国档案》1988年第2期,第10~20页。

③ 《中日外交史料丛编》(四),第37~39页。

④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第663页。

⑤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第663页。

通航(空)的反要求,^① 双方不欢而散。面对日军在华北步步进逼,同时日人又不断在中国其他各地寻衅,中国民众的抗日情绪日益激愤。1936年8月和9月相继发生了成都事件和北海事件。日本方面电令驻华大使川越茂与中国外长张群交涉。中国方面的态度则日趋强硬,对日本的无理要求采取敷衍和拒绝态度。1936年9月16日起,张群同川越茂举行一系列谈判,商谈事件的处理问题。中国方面在谈判中采取了较为强硬的态度,使日本人的要求不能得逞。

日本在进行外交谈判的同时,还进行军事威胁。北海事件发生后,日本以保护侨民为借口,派出9艘舰艇驶到北海港,并曾两次企图强行“武装登陆”。对此蒋介石两次电令军政部长何应钦“预防对日交涉恶化,应即准备一切”。“务令京沪汉各地立即准备一切,严密警戒,俾随时抗战为妥”。^② 10月8日,蒋介石接见川越茂,强调指出:“我方所要求者,重在领土之不受侵害,及主权与行政完整之尊重。”并再次向川越着重声明“华北行政必须及早恢复完整”。^③ 同月17日,蒋介石致电何应钦,要他转告宋哲元:“中央对日交涉以华北行政主权之完整为最小惟一之基准,望其坚持一致为要。”^④ 蒋介石这时已清楚地意识到“倭寇之威迫,岂外人所能知哉?……交涉迟早必至破裂,准备实不可一息缓也”。^⑤

为此,1936年11月10日,蒋介石命令张群在交涉破裂时,要预行拟定宣言,在宣言中应再次强调“应以完整华北行政主权为今日调整国交最低限度”。因为“今日完整华北之主权,乃为中国生

① 《中日外交史料丛编》(五),第370页。

②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第673、675页。

③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第675页。

④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第677页。

⑤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第679页。

第一编 日本侵华与中国的局部抗战

死存亡惟一之关键”。宣言要表现出“虽至任何牺牲，亦所不恤之意”。^①次日，蒋介石再次致电张群，要他在同日本方面签订上海至福冈通航条约时，“最好载明以附件规定，此附件即待华北非法航行停止后，再订沪福开航日期，必须有换文，否则不可签订”。^②双方交涉陷入僵持之中。

1936年11月14日，日本主使伪蒙军侵犯绥远，绥远战事爆发。这更使刚刚走上轨道的中日交涉无法进行。12月3日，日本海军水兵在青岛登陆，事态更趋紧张，中日交涉始告停顿。

1937年1月20日，日本大使馆秘书须磨、武官雨宫巽奉调回国，向张群辞行。张群坦诚指出：“华北问题为调整工作之中心问题，‘满洲国’问题虽可不谈，但华北现状急须改善，此为我方最低限度之调整。此项工作具有成效，然后始能考虑互相等而合法之提携。”同时告知日本“我国决由外交途径进行调整交涉，而同时在他方面又不能放弃抗日之准备”。^③显然，日本方面对此是不能接受的。1月25日，日本所谓“稳健派”的主要代表、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石原莞尔，以参谋本部的名义向政府提出：“为完成战争准备，……应改变对华政策，即以互惠互荣为目的，将主要力量投入经济和文化工作中。”^④石原的建议，是日本政府政策转变的一个信号，同时也表明日本方面避开了政治交涉的层面，企图迂回曲折，以经济和文化的交涉取而代之，从而达到迷惑中国，使中国不战而屈的目的。2月，日本广田内阁倒台，林銑十郎组阁，以佐藤尚武为外相，标榜“不尚武”的佐藤外交，向中国展开了微笑攻势。3月

①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第680页。

②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第680页。

③ 《中日外交史料丛编》（四），第96～100页。

④ 《现代史资料8·日中战争1》第384页；《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第303页。

间,以儿玉廉次为团长、由日本银行家和实业家组成的经济使节团来华访问,称此行“只谈经济,不谈政治”。儿玉等人几次与蒋介石、张群、吴鼎昌等头面人物接洽会晤,一改过去责问、刁难的神气,态度缓和。同时在华北,日本政府采取措施改善与华北当局的关系,邀请宋哲元、张自忠赴日参观陆海空联合演习,并对访日的张自忠等热情招待。

然而面对“出于战争前夜日本侵略政策的战术上的必要”^①的佐藤外交,中国方面坚持不能把政治交涉同经济等交涉分而待之。1937年4月19日,张群召见即将返国的川越大使时,要他转告佐藤外相,“对于华北问题与经济提携问题,宜同时加以全盘之研究,不必分前别后”。^②表明了中国政府在交涉中政经不能分离的原则立场。日本则在“中日提携”的宣传和一些外交步骤缓和的幌子下加紧准备施行全面侵华战争,对中国的要求一概未予置理。中日政治交涉至此完全失败。不久,近卫文磨上台组阁,华北形势更显紧张。日本迫使中国屈服的全面战争已是一触即发。

本章小结

华北事变的发生,使国民党的统治进一步受到威胁,南京国民政府逐步走向全面抗战的道路,其内外政策有了较大的转变和进步。在对日交涉中,态度有所强硬,由妥协开始转向抵制;国防准备也逐步加强;同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初步接触,但仍未彻底放弃内战政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南京国民政府开始筹划全国抗战,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36页。

②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第695页。

加紧国防准备,拨出巨额国防建设经费。1937年度经国民党中央会通过军费普通预算4.12亿元,军费建设专款2.22亿元,^①创自九一八以来南京政府军费预算史上的空前记录。由于停止了内战,免除了这部分最大的消耗,军费更显出其抗日价值。经济建设和交通建设也加紧进行,并拟定了具体的对日作战计划。南京国民政府在抗日道路上迈出了较大的步伐。

但是,南京国民政府的抗战准备,成效并不显著。一方面是因为长期以来它的军事重心放在“剿共”上,“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造成了连年内战,军费浩繁,内外债沉重,入不敷出的财政使国防建设费用受到极大的限制,国防计划难以实施,耽误了宝贵时间,消耗了有限的国力;另一方面则由于中国经济不发达,工业落后,尤其是化学、钢铁、机械、光学仪器等工业的薄弱,使中国几乎没有生产诸如飞机、舰艇、坦克以及各种重武器的能力。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面前,南京国民政府难以在短期内扭转被动局面,这就在客观上加重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艰苦性和曲折性,中国必须付出重大牺牲和代价才能取得抗战最后胜利。

^① 《何上将抗战期间军事报告》(上),第115页。